

【民族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思考双语教育

马 戎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00871)

摘 要: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社会学家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一些理论性的思考, 但是对社会理论的这些探讨是基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实证性调查, 而不是书斋中的逻辑推理。由于人类起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多元以及各人类群体发展初期的彼此隔绝, 在不同的群体中各自发展出来了很不相同的语言与文字, 也发展起来了以各自语言文字为承载工具的文明及教育体系。而当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需要相互交流与学习的时候, 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便成为这种交流和学习的必要条件。随着欧洲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 启蒙运动的思想、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学校体制也从欧洲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对于外国语言的系统学习逐步成为许多国家正规学校体制的组成部分, 各种形式的双语教育也就成为世界性的现象。

关键词: 社会结构; 社会发展规律; 语言的双重性; 语言的使用; 双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07) 06-0011-07

自然科学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增强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 并以此改善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与生活质量。社会学家也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规律的探索使人类社会达到稳定与和谐, 减少社会冲突, 缓和社会矛盾, 使人类社会能够健康地发展。对于什么是“双语教育”及如何定义的问题, 在学者中存在不同看法, 这里不详细讨论。在中国场景中讨论双语教育, 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文字的现象。所以, 中国双语教育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各级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对于各类科目教学语言如何进行选择与组合。即是要安排让哪些学生, 通过哪一种语言, 去学习哪些知识与技能。在进行这些选择与设计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语言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做一些分析。

一、语言的双重性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 语言从自身性质和发挥功能而言具有某种双重性:

第一, 语言是本民族文化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与发展出来的, 在其过程中也不免对邻近民族的语言文字有所借鉴。这个民族历史的正式文本及后人的追述、民间创造的英雄史诗, 这个民族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文学、农学等所有方面的知识与

文化积累, 都是用本民族文字记述下来的, 所以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寄托和体现出一个群体的精英集团和广大民众对于本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 民族语言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所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前途, 通常受到这个民族的领袖人物、精英集团和民众的极大关注, 认为它与这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紧密联系。

第二, 语言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语言和文字在民族内部交流中实现的是传递信息、文化遗产的功能, 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体现的是从其他群体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当语言被看作纯粹是工具时, 选择或放弃哪种语言学习, 只有理性的选择, 可以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为了向其他民族学习知识, 使个人和自己的民族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得到发展, 人们就必须学习那些掌握先进科技、引领经济潮流民族的语言文字。由于语言具有这样的双重性, 而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又不平衡, 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每种语言文字的角色与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 辩证和动态地来认识每种语言的发展趋势。

从语言的工具性这一性质来思考和评价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 必须承认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世界结构中, 有一些民族的语言在历史发展的竞争态势中是居于劣势的, 而另外一些语言则居于优

【收稿日期】 2007-07-18

【作者简介】 马戎 (1950-) 男, 上海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势。在生产技术的推销方面,不同的技术之间存在着争取用户的竞争关系,一旦采用了某一种技术,企业今后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就对这一技术及其开发者存在某种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今后再改用其他技术,必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在争取其他民族学习自己的语言方面,不同的语言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选定了某种外国语言作为本国的主要学习外语,在教材、师资、考试等方面进入了必要的投入,如果要再改为另一种外语,除了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之外,使新系统运转起来并达到较高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试运行和不断调试,这一过程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那么,采用什么指标来对一种语言的工具应用性进行评价,并以此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我们认为语言的工具性也许可以通过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第一,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口规模:即以该种语言为母语或国内公共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群体的人口规模。

第二,某种语言所能够提供的科技、财贸、学术等领域的信息的先进程度:以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先进性为例,我们可以根据学术界提供的出版信息,了解到各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当中,有百分之多少是以该种语言文字公开发表的,占据高百分比的文字,即体现出较高的先进信息提供程度。

第三,可通过某种语言进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体的人口规模:即除了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口(第一个指标)外,还有多大规模的其他人口能够熟练掌握该语言,或以该语言为第一外语,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口头或文字交流。

如果我们以英语为分析对象,那么第一个指标即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牙买加、新加坡等通用英语国家的人口,再加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菲律宾等虽有地方语言但以英语为正式官方语言国家的人口);第二个指标是最新科技成果、学术成果以英文发表的比例(如各学科顶级学术刊物中英文刊物的百分比)^①;第三个指标包括了主要以英语为本国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要求各级学校升学考试中有英文科目的国家的人口(包括中国、日本、欧洲等许多国家的人口)。以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很明显英语具有

的工具性程度是目前世界各种语言当中最强的,尽管英语第一个指标的数值可能低于汉语(汉族人口加上回族、满族等通用汉语民族的人口,超过12亿),但在第二个指标和第三个指标中,英文不仅明显地高于汉文,也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

在语言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强势语言的影响力会不断增大,弱势语言的影响力会渐趋缩小。在以上的三个指标中,各种语言的第一个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一种语言的第二个指标的数值明显高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学习这种语言,使它的第三个指标数值不断扩大。

有些民族的人口规模很小,可能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它们在知识积累方面没有优势、与其他民族相比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方面也没有优势,除了本族成员之外没有其他民族学习并使用该族语言,这些民族语言的工具性程度就比较低。对于这些人口较少、发展呈弱势的民族来说,如果它们使用本族语言文字来建立一整套教育和科研体系,那么从教育(教材编写、教师培训)体系、印刷出版和新闻传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难度很大、成本太高、效益太低,客观上并不利于本民族的教育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使得这些民族语言作为信息交流工具呈现一个功能持续弱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一些少数群体,有的甚至从来没有书写文字,在语言的客观竞争过程中,他们的语言有些已经消亡,有的正处在消亡过程之中。语言学家指出,在1万年以前,世界各地存在的语言约1.5万种,现在已经减少到约7000种,随着族群交往的加强与全球化进程而将进一步加快消失的速度,预计大约在本世纪中还将会有3000种语言消亡。

我们在讨论与分析语言的工具性时,还需要关注不同语言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应用层面。譬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母语依然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它的工具性功能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交流活动中。与此同时,为了走出民族社区并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与技能,学生们在学校里需要系统地学习汉语和英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汉语的功能是帮助学生接触大量的汉文出版物、影视节目和各类信息,使

① 这一方面我们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单从2006年美国学者囊括全部诺贝尔科学奖奖项这一现象来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说现在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顶尖级学术期刊都是以英语出版的。

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就业与发展；英语的功能是帮助学生接触英文出版物和各类信息，使学生有可能接触到世界的科技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直接了解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与文化。根据交流和阅读对象的不同，根据交流中所能够获得信息的层次，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交流与知识层面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交流工具的功能。这就形成了一个语言使用的多层次结构，这一结构也因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有些处在最基层的语言，可能会由于使用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小而逐渐消失，而处在最高端的国际交流的语言则因国际力量对比和外交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调整，如我国学校系统在解放前教授的外语主要是英语，20世纪50年代开始转变为俄语，80年代后又转变为英语。在分析语言的工具性时，需要采用辩证和动态的眼光，而且只能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才能够观察到语言使用结构的细微变化。

从文化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语言与文字，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已经消亡的文字如古埃及楔型文字、古玛雅文字、中国历史上的西夏文字、古西域的吐火罗文字等，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应当作为人类的“文化基因”永久保存下来。同时，另外对于一些曾经流传使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失的语言，语言学家们所能够做的，也就是积极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把这些语言记录下来，作为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鼓励少数的语言学研究者去学习这些濒危语言，分析其语音元素及语法规则，努力从中探索各种语言起源之间的联系和语言传播、演变的路径。但这些消亡或濒危的语言将主要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由于其在现实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工具性，人们不再把它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所以它们也不可能成为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工具，不应当被选作学校的教学语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文化科技的发展与语言的推广

在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的发展大趋势下，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工具性呈现出相对弱势，但这个民族坚持只使用本族语言文字而不是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保守心态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竞争态势下，有些民族曾经居于劣势，但它们及时认清形势，放下架子，在语言问题上克服了狭隘和

保守的民族主义态度，以谦虚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发展速度较快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以此为工具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财富和科技成果，积极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的大市场中，这些在语言和思想方面比较开放的民族就会因此而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一旦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后，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发展了经济实力，回过头来更有条件保护与宏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和日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最后的发展效果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现在各国之间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难以避免地将会呈现出一个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人们在感情上对某些语言的消亡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客观现实，因为这实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语言的工具应用性方面分析，在争取语言的使用者方面，各种语言之间凭靠本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这就像向用户企业推销制造技术与设备时，各种技术和设备的制造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样。为了扩大本国文化和国际影响，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各种语言推广项目，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众与学生学习和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时代，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都曾经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语言，也都出现了各自的大师级文学巨匠，当时，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和殖民地社会都在积极学习欧洲语言。与其他几种欧洲语言相比较，英语并没有占据特别的优势。但在二战之后，以上语言之间的某种“均势”开始逐渐被打破。由于美国在军事、财力、科技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美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而各国申请“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资金使用报告、项目结题总结等文件，都必须用英文撰写，与美国做生意成为各国经济的主导，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工具作用大幅度加强，这都在客观上导致西欧国家和日本开始学习英语。

由于历史原因，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比较落后，美国每年向这些国家提供几万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去美国留学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非常具有吸引力。而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需要有“托福”和“GRE”英语考试成绩，这样各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本国广大家长与学生们学习英语的要求，普遍把英语作为本国学校中的第一

外语。这样几十年后,各国学生与学者普遍学习和掌握的外语就成了英语,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趋势是,各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主要靠英语,各类国际会议也把英语作为会议的公共语言。

与此同时,在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术交流中选择一种语言作为所有国家的“共同交际语”,这也是客观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学术研究的全球化都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工作语言。由于具有以上的种种优势,英语也就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成为各国共同学习的首选外语,也正在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性”工作语言。

所以,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语言的双重性中两方面的权重在发生变化。对于语言的感情层面的考虑有下降的趋势,而对语言的功利方面的考虑则在显著上升。学习掌握先进科技和引领经济发展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各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的语言使用与发展趋势

针对中华民族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所具有的“同”和各个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特点具有的“异”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教授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大框架(费孝通,1989)。我们在研究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发展框架时,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这个思路,从“多元一体格局”这个角度来理解与分析。

我国的学校系统和语言教学体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对于学校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学制课程与考试的设置等,全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在一个范式下组织起来的,虽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带有某些区域性或民族性特点(如草原牧区的流动小学、寄宿制学校),但总体来说是属于同一个管理体制、同一个教育系统,体现了“一体”的层面。同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本族语言仍然是主要的交流语言,在学校里使用的教学语言(双语教学)结构中,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的特点。汉字和普通话是各族学生都需要学习的语言文字,各少数民族根据本族语言文字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学习本族文字,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种文字来学习其他科目的知识。

从全世界各国的角度看,现代学校教育是是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联系在一起,是推动国家区域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与整合的重要措施,实

施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就在国家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教育的通用性和知识的标准化,考虑到当前于今后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逐步整合和人力资源的跨地域流动性,为了各民族今后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长远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规范化教育体系,需要强调“同”和“一体”这一方面。但是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又决不可忽视现在各地区、各民族在语言、知识基础方面所存在的“异”和“多元”的现实,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连接的桥梁,建立一个在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妥善处理两者关系的协调机制。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就全国而言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6个民族全部或大部转用了汉语,近40个民族有大部分人兼通汉语。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看作是“汉族的语言”。

印刷出版和影视媒体是人们获得各类知识信息的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渠道。在我国,汉语文的出版物和其他音像制品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第一,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第二,汉族学者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用汉文出版;第三,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和其他出版物被译成汉文出版;第四,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用汉文发表或出版。我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掌握这些资源,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和个人所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期望能够把以上各方面的知识信息都及时地翻译成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字,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可以通过阅读汉文出版物接触到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重要信息。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文就可以走遍全国。由于中文(汉语)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国外学习中文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既有在校的学生,也有从事

外交、贸易、学术研究的人员，加上居住在世界五大洲的 2500 多万华人华侨，在许多国际性大都市中，汉语也可以帮助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所以从国际交流的角度看，中文（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应用性在未来将会不断加强。在全国各族民众中逐步普及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在今后至少半个世纪内，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在各级学校中的英语教学。这既是为了使中国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们能够及时和便利地接触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与国际一流学者们对话与合作，从而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真正走到世界的前沿，也是为中国的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加快和强化我国学校的英语学习，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和英语，是中国在 21 世纪全方位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措施。

四、双语教学的目的与设计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当今世界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教授两种语言。一种是本地的通用语言，一种是为了学生今后的交流与发展而学习的另一种语言。

双语教学的体制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在语言方面的基本政策。我国的宪法关于语言有两条规定，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部、国家民委 1980 年《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汉文”。这些法律和政策既考虑到了民族语言平等和各民族交流这两层政治因素，也考虑到民族地区语言环境的现实应用的情况，体现了从客观效果出发的科学态度。

政府教育部门在规划、安排和发展双语教学体制时，提出的原则是：“要以当地语言环境为基础，同时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学效益和群众的意愿。原则上，凡只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环境的地方，基础教育宜实行用民族语文授课为主或从民族语文教学入手，逐步通过语言转换实行以汉语文教学为主；有一定双语环境或某些地方土语区，基

础教育宜实行用汉语文授课为主同时加设民族语文课的体制”。^{[1] (P88)}同时明确提出，“实行既与民族学生语言基础相衔接、又与全国语言环境相一致的双语教学体制，是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普及教育，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必备条件”。^{[2] (P10)}这些政策和提法，基本上体现出了“多元一体”的大思路，考虑到实际当中存在着的“多元”（民族语言的地方性应用）和“一体”（全国性的语言应用大环境）两个方面，为了避免政府对于语言“应用性程度”判断的偏差，避免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人为强化“多元”或人为强化“一体”）还特别提出要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这一点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3] (P247-250)}

在中国各个地区，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可能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模式。

在汉族地区，使用母语即汉语文来讲授“语文”和数理化等专业科目，同时学习英语或其他一种“外语”。

在云南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或者政府虽然为他们“创造”的新文字但使用范围非常小^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学习的是非母语的国内通用汉语并用汉语文学习专业科目的知识，同时学习一门外语。

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地民族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这些民族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语言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使用中的工具性不强，根据各地的语言使用状况，学校的教学语言可分为多种模式^②，汉语文和当地民族语文在教学语言中，扮演不同角色。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民族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和悠久文化，而且这些民族人口规模较大，民族语言在聚居区是主要交流语言，这些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是：以少数民族语文教授各科课程，加授汉语课，并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体系。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自治地方基本上采用的这样的教学模式。

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双语教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值得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这就是少数民族大学和大中专毕业生日益突出的就业困难对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的挑战。以

① 我国有 10 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语言专家为他们创制的。

② 如据凉山彝族自治州 2005 年的统计，少数民族学生中有 1.5% 为“一类模式”（即以彝语文教授各科课程，加授汉语课），27.3% 为“二类模式”（即用汉语教授各科课程，加授彝语课），另外的 61.2% 在普通学校学习（赵蕊，2006）。

新疆为例,近年来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教学模式:“双语教学实验班”,自小学(甚至学前班)起即开设汉语课,同时用汉语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开设母语课,同时用母语讲授历史、政治、地理、自然等课程。

在某种意义上,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个“工厂”,“产品”就是自己的毕业生,“顾客”就是就业市场上的雇主。学生掌握的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就是“产品”的型号与规格。如果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就相当于“产品”型号规格不符合顾客的要求,就会滞销、积压。这样就要求学校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型号与规格,重新调整自己的“生产流程”。否则这所学校就没有对学生和社会尽到应尽的责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比较简单,政府劳动部门根据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计划进行汇总,就可以制定今后几年的劳动力分配方案,并按照这样的方案通知教育部门调整各专业方向的招生规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毕业生需要自己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寻找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结构,学校和家长们都无从了解,只能从历届学生毕业后在求职过程中提供的零星信息,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这肯定是不准确不科学的。这就需要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组织开展对当地就业市场的用人信息的调查研究,进行系统分析,为学校修订自己的专业设置和培养计划提供依据。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

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许多民族,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学习自己的母语维语或哈语,并用维语学习各项专业科目,同时学习汉语。但是近些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在就业求职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很简单,一是现在各用人单位内部雇佣了不少汉族职员,业务工作也需要与汉族地区、港台地区进行大量的交流,汉语不熟练,内部和外部的交流都有困难;二是现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专业设备、专业术语主要是汉语,有的还需要英语,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里用维语、哈语学习的数理化等专业术语无法与同行们交流,无法发挥作用。这样少数民族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就必然会遇到困难。

面对大量少数民族大学大专毕业生就业困难的

问题,加强汉语学习,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文来学习数理化等各项专业科目,对这些学生今后的就业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也是从语言的“工具性”来思考如何调整现行双语教育体制的作法。

在这样的语言教学模式下,学习汉语,并用汉语文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同时积极掌握一门外语,这样的语言和专业学习结构,符合国内绝大多数地区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需求,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这一态势,正日益被各少数民族群的民众认识到。我们在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家长与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许多地区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解决就业问题和开发本地人力资源和发展经济的考虑,也在积极推行双语教育,加强学校的汉语文课程并且推动使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等专业课程。

但是全面推行双语教育、提前学校开设汉语文课程的年级、使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等专业课程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学生的语言基础、适用的教材体系、具有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队伍是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少数民族学生在小学和初中只有一门汉语文课并使用母语学习各门课程,那么在短时期内把数理化等课程的教学语言全面改变为汉语,学生在理解课程内容上必然存在困难,从而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当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开始实施教授汉语后,那么六年后的初中学生才有一定的汉语理解与表达能力,九年后的高中学生才有比较令人满意的汉语理解与表达能力,而这样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必要条件。在达到这样的条件之前,就需要设计一定的“过渡期”的教学办法,如允许教师在讲授数理化时使用学生母语进行必要的教学辅导,达到汉语学习和专业学习并重,既积极推动双语教学,也保证让目前的在校生成绩达到一定水平,对这几届学生今后的就业与发展负责。

现在使用的汉语教材主要是全国通用教材,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双语教育和加强汉语课程,必然需要增加一定科目与课时,而学生的学习总课时和学习时间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无限增加。全国通用教材(无论是语文和数理化等科目的例子和应用题)中关于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少,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需要进行适当的改编,以提高学习质量。一是可以减少汉文课本中的古文部分及课时;二是适当增加汉语课文中有关当地历史和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双语教学的教师队伍需要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能够熟练流利地使用汉语以提高汉语文教学水平,同时要能够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以便与汉语尚不熟练的学生交流。目前达到这一要求的教师很少,所以需要系统和大规模的培养双语教师。一是解决目前的急需,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培训;二是招聘调入部分汉族教师,为有一定汉语能力的高年级学生上课;三是大规模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汉族学生,使汉族教师在双语教师队伍中占有一定比例,向少数民族学生介绍中华文化和公民教育,这对推动文化交流和政治整合具有积极作用。

在推动双语教育并强调使用汉语讲授专业课程的同时,需要注意课程语言结构不要完全“一刀切”。考虑加强汉语教育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就业市场对汉语能力的要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后都会在一个汉语文的环境中工作。比如某些专业的学生,如果毕业后有相当一个比例会回到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相关系统去工作,他们工作中的大多数同行、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维吾尔族,他们的工作文件主要用维吾尔文来书写,那么,我们是否就应当根据这一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这些专业安排一定的学生用维吾尔语文来学习专业知识?如果只用汉语文学习这些专业知

识,回到南疆后还要学习维吾尔文的相关专业词汇,这也是学习资源的一种浪费。

至于是否需要某些专业继续设置民族语言班?规模应该有多大?考虑现有中小学的语言学习情况,是否需要设计一些过渡的办法?这些都是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够回答出来的问题。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根据交流的实际对象是什么人,根据使用哪种语言的交流效果、工作效果最好,我们就应当选择使用哪一种文字来组织教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我们可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调整语言教学模式。社会学最重视的是社会调查,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各方面的相关人员对有关情况的介绍,倾听他们的观点,听取他们的分析与建议,努力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中探索双语教育和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客观依据,靠事实说话,我们才可能对其他人做有效的说服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一是民族平等,二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现在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研究双语教育的发展,需要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民众的愿望,这样,我们就可以切实地推动社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 [1] 周旺云. 谈四川民族地区的教育体系问题 [A]. 陈红涛, 孟铸群. 中国民族教育论丛(四)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 [2] 田清玉. 以改革总揽全局, 探索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路子 [A]. 陈红涛, 孟铸群. 中国民族教育论丛(四)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 [3] 马戎. 民族与社会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2] 赵蕊.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凉山彝族双语教育 [D].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论文, 2006
1. 潘启富. 中国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研究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6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MA 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ociology aims to study social structures and social changes. Sociologists have som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are based on their actu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 world rather than on the armchair logical deduction.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diversity of human origin and the early iso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groups, they developed quit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writing systems that are the carrier of their civilizations and education systems. When different nations and countries want to share each other's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ing the other's language and writing become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ir succes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the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lonialism, th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dern school systems in Europe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is, the systematic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cessary part of the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in many countries, and various kind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have become a popular phenomenon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duality of language; use of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杨国才)